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如何影响农户获得感*

——基于湖北省 1036 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

李东平 田北海

摘要：本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主观福祉效应为分析视角，依据 2021 年湖北省 7 个地级市 1036 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获得感。在利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共教育服务可及性、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劳动就业服务可及性的获得感提升效应较为突出，公共文体服务可及性则没有显著提升农户的获得感。在作用机制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可以通过增进农户的生活福祉和公平认知提升其获得感。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一般农户相比，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脱贫户获得感的提升作用更大；与低财政投入水平的村相比，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提升效应在高财政投入水平村更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审视并理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在推动共享发展进程中的政策效应，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农户民生福祉、实现共享发展提供证据支撑。

关键词：获得感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生活福祉 公平认知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获得感是反映民生福祉的本土化概念，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期许与价值表达（郑建君，2020）。在全面深化改革、全民共建共治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治理格局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新标尺（邢占军和牛千，2017），而平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是人民群众共同分享中国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最好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过渡期后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编号：23BSH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田北海。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①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②。可见，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是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和获得感的重要方式。

在《“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推动下，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满足人民群众生存发展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和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衡问题还比较突出，民生福祉建设的重点仍然在农村。对农户而言，在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的基础上，其获得感的提升已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和基本的安全需求，而更多来自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的补齐（辛超丽，2021）。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表明，“自上而下”以供给为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已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需从“供给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尹栾玉，2016）。从农户需求视角看，反映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使用状况的可及性指标能够衡量政府供给与农户需求之间的契合度（Cascetta et al., 2013），借助这一指标可以有效评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农户需求的满足程度。同时，随着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已经开始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迈向“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治理新时代（缪小林等，2020），获得感也成为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和治理效能发挥程度的重要维度（姜晓萍和康健，2020）。因此，全面厘清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及其逻辑链条，不仅有助于刻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的民生福祉效应的路径和领域，还能够准确识别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为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学术界的相关探讨主要围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测度评价和民生福祉效应两个方面展开。从测度评价来看，多数研究从政府供给视角出发，选取财政投入、公共服务覆盖率、某项基础设施的人均供给水平等指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供给效率和均等化程度进行了测算评估。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取得了很大改善（刘玮琳和夏英，2018）。然而，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一直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薄弱环节，仍然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服务质量不高、使用效率偏低等短板（郭美荣等，2021）。此外，部分学者基于农民需求视角，从满意水平和需求程度两个维度分析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次序，为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供了政策借鉴意义。例如，陈秋红（2019）的研究表明，农民对劳动就业和便民服务这两个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仍有较

^①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页。

^②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6页。

强烈的需求，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从民生福祉效应来看，一部分文献从宏观层面评估了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对农村减贫、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相关研究均证实，基本公共服务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发挥再分配功能、实现均等化赋权等途径降低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张楠等，2021），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李实和杨一心，2022）。另一部分文献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农民生活福祉的影响。在客观福祉方面，相关研究一致认为，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和利用有助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减轻经济负担、降低健康风险等渠道改善农民的经济福祉和身心健康（毛捷和赵金冉，2017）。在主观福祉方面，相关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补齐民生短板有助于提升农民群众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周绍杰等，2015）。

回顾以往文献，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学者们往往从供给视角出发，采用财政投入、公共服务覆盖率、某项基础设施的人均供给水平等指标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进行评价。然而，从需求视角出发，评价基本公共服务获取与利用的实际状况的研究则比较少。事实上，个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获得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和个体需求因素的共同作用。这意味着，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户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必须围绕农户微观层面的个体特质展开（邓睿，2022）。第二，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观福祉效应的评估主要围绕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展开，而涉及获得感效应的研究则付之阙如。比较而言，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因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偏向而易流于空泛，强调实际受益情况的获得感效应因更具外部指向性从而更能准确反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水平。第三，现有研究多以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普惠性这一前提为基础，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对个体主观福祉的同质性影响，忽略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因国家战略需要和政策执行偏差等而引发的非均衡现状。为此，本文基于湖北省 1036 个农户样本的微观调查数据，引入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这一概念，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对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和提升农户主观福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并分别考察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具体影响，弥补了相关微观实证研究的不足；第二，在理论机制上，本文从增进生活福祉和公平认知两个维度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影响农户获得感的相关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在研究视角上，本文考虑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在不同类型农户和不同财政投入水平的村庄中的现实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农户主观福祉的非均衡影响，能够为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提供决策依据。

二、概念界定、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概念界定

基本公共服务通常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政府部门为了满足全体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而提

供的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平等性特征（郁建兴和秦上人，2015）。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界定为政府部门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而提供的、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类公共服务。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罗列的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的重点领域和《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中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同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界定为公共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劳动就业服务和公共文体服务4种类型。其中，公共教育服务指政府为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经济困难家庭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机会而提供的免除学杂费、提供教育补助、就近入学等经济资助或政策安排；医疗卫生服务指政府为防范和化解农户健康风险以及保障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福利所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重点人群健康服务、重点疾病治疗等制度安排或健康干预；劳动就业服务指政府为保障农户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而提供的工伤保险、技能培训、职业指导等权益保障机制或服务项目；公共文体服务指政府为满足农户运动健身和精神文化需求而提供的体育场馆、图书馆、文化产品展播等文体设施或服务项目。

“可及性”这一概念最初被界定为“服务的使用”，用来评价医疗卫生服务的使用状况（Andersen, 1968）。后经相关学者引入“顾客与系统之间的适配程度”的定义后（Penchansky and Thomas, 1981），可及性的概念、内涵与应用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多被用于评价公共服务体系与所服务对象的适配程度，直观地体现为实际发生的服务行为及其结果（任梅等，2020）。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用农户实际获得的基本公共服务度量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程度，以此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实现程度与农户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契合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依据需求理论，获得感来自个体需求的社会性满足程度和由此产生的心理认知与体验。结合具体社会情境，获得感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寡以及对这种成果享受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丁元竹，2016）。从需求得到满足的社会性条件看，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多种需求的客观性满足以及对这种满足的主观评价是个体获得感生成的核心基础（谭旭运等，2020）。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主要矛盾的转变，农民群众对能够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福祉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解决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是其中的关键。与追求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效率的供给导向相比，能够反映民生福祉的获得感指标意味着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评价内容由“供给的实现程度”的供给侧视角转变为“供给满足需求的程度”的需求侧视角（邢占军和牛千，2017）。这种转变能够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紧密联系起来。在新发展阶段，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供需衔接不精准问题依然突出，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保障和文体服务等公共服务成为农民群众最为迫切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姜晓萍和吴家宝，2022）。具体而言，第一，就近入学、费用减免和经济资助等公共教育服务有助于充分保障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的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减轻家庭教育支出的成本，从而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第二，对基本医疗保险、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重点人群疾病干预等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一方面能够帮助农户有效应对家庭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避免因医疗支出过大而使生活质量大幅降低甚至陷入贫困状态；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农户的

身心健康水平,保障其公平享受公共卫生服务的权利,缩小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福利差距。第三,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就业促进等劳动就业服务可以为农户提供正式的劳动权益保障、丰富的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增加农户的经济参与机会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第四,公共文体设施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有助于保障农户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其日常的公共文化生活需求,从而改善其生活质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切实解决农户对民生服务的需求,有助于提升农户的获得感。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与农户的医疗、教育、就业、文化等生存和发展权益密切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解决农户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提高农户的生活福祉,奠定获得感生成的客观物质基础,进而实现农户生活福祉和获得感的提升。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确保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增进农户对公平的认知,满足获得感生成的主观心理条件,进而提升农户的公平认知和获得感。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第一,生活福祉的耦合效应。生活福祉是个体生活水平的综合反映,包括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两个方面。客观福祉是对个体生活水平的客观评价,主观福祉则是个体对其生活水平的认知和满意程度(檀学文和吴国宝,2014)。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户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新的社会需要。这种美好生活既包括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反映在主观心理体验的满足上,是人们基于一定社会标准对自身生活福祉追求的价值表达(项久雨,2019)。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由政府主导提供、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物品,是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根本保证。然而,中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制约了一部分群体公平、充分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益的实现(李实和杨一心,2022),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成为农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一方面,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有助于满足农户在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客观需求,切实增进农户的收入、消费、健康等客观生活福祉,进而提升其获得感。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免费属性,在农户收入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意味着更高的主观福祉水平(Baldini et al., 2018),因而可以促进农户获得感的同步提升。

第二,公平认知的诱致效应。从获得感的生成路径来看,获得感不仅是个体基于“绝对获得”的一种主观体验,同时还受“相对获得”的影响。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获得感本身内含了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吕小康和黄妍,2018),个体与参照群体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的结果会产生满足感、剥夺感等得失感知属性截然相反的情绪体验(Runciman, 1966)。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个体获得感的生成不仅要以实际的客观获得作为现实基础,同时还与个体对自我获得的处境和社会分配环境的公平性等的认知密切相关(黄艳敏等,2017),即公平认知对个体获得感的生成具有诱致效应。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是提升民众获得感的重要社会基础,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以便保障人民群众的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骆永民等,2021)。具体来看,现阶段,由于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和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

布呈现严重的非均等状态，这是影响农户公平认知和获得感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性，有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降低由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发展差距带来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减少社会比较带来的“获得感损失”。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农户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获得，降低农户在自我获得方面的相对剥夺感知；另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农户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机会与权利，使其实现社会分配上的相对公平感向个体获得感的顺利转化。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影响农户获得感的分析框架，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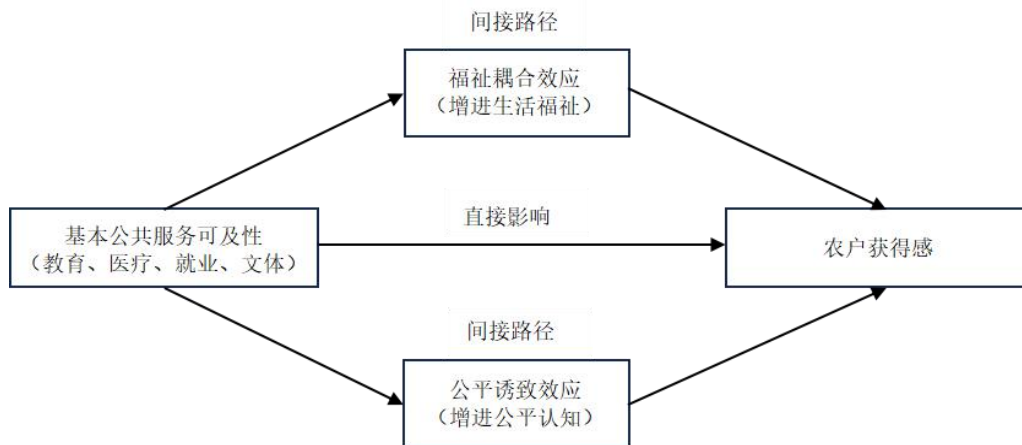


图 1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影响农户获得感的逻辑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 H1: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能够增强农户获得感。
- H2: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能通过增进农户生活福祉提升农户获得感。
- H3: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能通过增进农户公平认知提升农户获得感。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 2021 年 5 月至 8 月在湖北省开展的实地调研。在习近平 2013 年关于“努力把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争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走在全国前列”^①的战略定位下，湖北省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民生建设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表 1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截至 2020 年底，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和公共文体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建设领域，湖北省的各项指标与全国总体水平大致相当。因此，探讨湖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民生福祉效应，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可及和促进高

^①资料来源：《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推动持续健康发展——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讲话精神》，<https://news.12371.cn/2013/09/17/ARTI1379365121735767.shtml>。

质量发展成果的共享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

表1 2020年湖北省与全国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比较

类别	指标	湖北省	全国
公共教育服务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89.0	85.2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8.3	95.2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2.3	91.2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1.1	10.8
医疗卫生服务	人均预期寿命(岁)	78.0	77.9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床位数(张)	7.1	6.5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2.8	2.9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人)	3.5	3.4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95.0	95.0
劳动就业服务	参加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人数(万人次)	134.3	87.1*
公共文体服务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平方米)	2.0	2.2
	每百户居民拥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平方米)	29.8	34.7

注：①以上统计数据来自《湖北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国家统计局网站、《全国“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②带*数据为各省平均值。③受数据可得性限制，以上每个类别仅列举部分指标的信息。

在样本确定方面，课题组根据地理位置将湖北省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调查遵循多阶段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在三个区域各随机抽取2~3个代表性地级市，分别为武汉市、黄冈市、襄阳市、宜昌市、孝感市、十堰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其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在上述7个地级市随机抽取2~3个县（市、区），在每个县（市、区）随机抽取2个代表性乡镇，在每个代表性乡镇随机抽取1个脱贫出列村、1个一般村，在每村随机抽取15户农户（含5户脱贫户、5户边缘易致贫户和5户一般户）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展开。在农户层面，采取访谈户主的形式，问卷内容包括家庭基本信息、收入消费、社会网络、公共服务、主观态度等内容；在村庄层面，采取访谈村委负责人的形式，问卷内容包括村庄基本信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与财政投入、社会帮扶与返贫监测等内容。此次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254份。考虑到公共教育服务的人群适配性，本文删除了家中无义务教育及高中（中职）学龄段子女的农户样本。在对各变量的缺失值、异常值等进行处理后，最终获得了包括1036个有效观测值在内的基准样本。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农户获得感。依据前文所述，获得感来自个体需求的社会性满足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认知和体验（满足感），主要表现为个体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实际收益得失的主观评价。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王浦劬和季程远，2018），本文主要从实际收益角度衡量农户的总体获得感，通过问卷中对“总的来说，与您家的付出或努力相比，您对您家所获得回报的满意程度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测度。受访者的回答选项包括“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5个选项，本文将其依次赋值为1~5的整数。从样本的情况来看，选择“非常不满意”选项

的样本所占比例为 1.17%，选择“比较不满意”选项的样本所占比例为 7.40%，选择“一般”选项的样本所占比例为 18.41%，选择“比较满意”选项的样本所占比例为 58.30%，选择“非常满意”选项的样本所占比例为 14.72%。

2.核心解释变量——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结合前文概念界定，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涉及范围广、普惠性程度高的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和公共文体 4 种类型服务的农户实际获取和利用水平来度量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以此反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户实际需求的适配程度。根据受访者对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或家人是否获得过下列由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公共文体服务？”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测量受访者获取上述 4 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

服务类型	具体指标
公共教育服务	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寄宿生生活补贴，免费营养餐，国家助学金，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
医疗卫生服务	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宣传，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健康服务，孕妇健康服务，老年人健康服务，慢性病患者管理，精神障碍患者救治，结核患者健康服务
劳动就业服务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就业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失业登记，创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人社服务热线咨询，就业见习服务，提供就业岗位
公共文体服务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公共场所免费网络服务，优秀文化产品展播，公共图书馆服务，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科技推广传播服务

注：①公共教育服务仅涉及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中职）学阶段。②针对以上 4 种类型服务中的每项服务内容，将“获取过”赋值为 1，“未获取”赋值为 0。

本文借鉴 Sarma (2016) 提出的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指数。该方法的核心思路在于，借用简单的多维几何概念，将多维度转化为一个矢量，在多维空间中以最优点和最差点为基准点，实际点到基准点的距离反映农户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情况。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指数由实际点到最优点（为“向量 1”）的反向距离和到最差点（为“向量 0”）距离的平均值衡量。最终可以得到一个介于 0 和 1 之间的综合指数，该指数能够反映农户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获取和利用水平。在计算过程中，本文两次使用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首先，将其用于分别合成公共教育服务可及性、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劳动就业服务可及性和公共文体服务可及性指数。其次，将其用于合成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总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ES_1 = \sqrt{\sum_{i=1}^7 d_i^2} / \sqrt{7}, ES_2 = 1 - \sqrt{\sum_{i=1}^7 (1 - d_i^2)} / \sqrt{7}, ES = (ES_1 + ES_2) / 2 \quad (1)$$

$$MS_1 = \sqrt{\sum_{i=8}^{19} d_i^2} / \sqrt{12}, MS_2 = 1 - \sqrt{\sum_{i=8}^{19} (1 - d_i^2)} / \sqrt{12}, MS = (MS_1 + MS_2) / 2 \quad (2)$$

$$WS_1 = \sqrt{\sum_{i=20}^{32} d_i^2} / \sqrt{13}, WS_2 = 1 - \sqrt{\sum_{i=20}^{32} (1 - d_i^2)} / \sqrt{13}, WS = (WS_1 + WS_2) / 2 \quad (3)$$

$$CS_1 = \sqrt{\sum_{i=33}^{39} d_i^2} / \sqrt{7}, CS_2 = 1 - \sqrt{\sum_{i=33}^{39} (1-d_i^2)} / \sqrt{7}, CS = (CS_1 + CS_2) / 2 \quad (4)$$

$$PS_1 = \sqrt{(ES^2 + MS^2 + WS^2 + CS^2)} / \sqrt{4} \quad (5)$$

$$PS_2 = 1 - \sqrt{(1-ES^2) + (1-MS^2) + (1-WS^2) + (1-CS^2)} / \sqrt{4} \quad (6)$$

$$PS = (PS_1 + PS_2) / 2 \quad (7)$$

(1) 式中, ES_1 、 ES_2 和 ES 分别代表公共教育服务项目的样本点到最差点的距离、到最优点的反向距离和平均距离, 共计包括 7 个子指标。(2) 式、(3) 式和 (4) 式中, MS_1 、 MS_2 、 MS , WS_1 、 WS_2 、 WS , CS_1 、 CS_2 、 CS 分别代表医疗卫生服务、劳动就业服务和公共文体服务项目的对应值, 共计包括 32 个子指标。 PS_1 、 PS_2 和 PS 则代表综合考虑 4 种类型服务项目的实际点到最差点的距离、到最优点的反向距离和平均距离。 d_i 表示计算后各服务项目相应指标的指数。由此可以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指标。统计发现, 在全部样本中, 农户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指数的均值为 0.20, 表明农户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与利用处于较低水平。分类型来看,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按可及性水平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公共文体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 具体情况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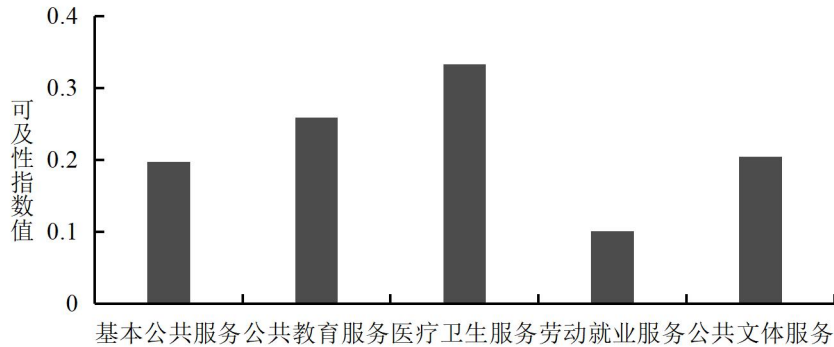


图2 农户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指数

3. 机制变量。本文将生活福祉和公平认知作为机制变量, 以进一步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影响农户获得感的作用机制。在对生活福祉的测量方面, 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 (George and Bearon, 1980; 檀学文和吴国宝, 2014), 本文选取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就业状况、健康水平、生活环境 5 项指标衡量客观福祉, 并采用熵值法构建综合指数, 以此反映农户的客观生活水平。具体而言, 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分别通过农户的人均收入对数值和人均消费对数值来测量; 就业状况通过农户的非农就业人数在家庭总人口中的占比来测量; 健康水平通过农户家中患有慢性病和大病的人数在家庭总人口中的占比来测量, 该指标为负向指标; 生活环境通过农户拥有的生活设备数量来测量, 包括洗衣机、电冰箱、液晶电视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电动车或摩托车 7 项内容, 每拥有 1 项, 得 1 分, 通过加总各项指标赋值后的总分来表示农户的生活环境水平。主观福祉体现为农户的生活满意度, 通过受访者

对问卷中“总体而言，您对您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测量。受访者的可回答选项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本文将其依次赋值为1~5的整数。在全部样本中，农户客观福祉指数的平均值为0.55，说明样本农户的客观生活水平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3.88，处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

在对公平认知的测量方面，本文以农户将自我成就归因于自我努力的程度表征其对自我获得处境的公平性的微观认知，通过农户对“您同意个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把握机会的说法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来体现；以农户对当下社会公平性的评判表征其对社会分配环境的公平性的宏观认知，通过农户对“总体而言，您同意当今社会是公平的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来体现。针对这两个问题，受访者的可回答选项均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完全同意”，本文均将其依次赋值为1~5的整数。赋值后的结果表明，在全部样本中，农户微观公平认知的平均得分为2.73，处于“比较不同意”和“无所谓”之间；农户宏观公平认知的平均得分为3.85，处于“无所谓”与“比较同意”之间。

4.控制变量。结合本文的数据，同时参考王瑜（2019）的做法，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户获得感的其他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及其平方项）、性别、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主观社会地位，家庭的收入水平、健康负担、关系网络，村庄的财政投入、村庄属性等。

上述4类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3。

表3 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获得感	受访者对自家所获回报的满意程度：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比较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3.779	0.828	1	5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指数	0.197	0.089	0	0.740
公共教育服务可及性	公共教育服务可及性指数	0.259	0.304	0	1
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	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指数	0.333	0.089	0	0.798
劳动就业服务可及性	劳动就业服务可及性指数	0.101	0.138	0	0.670
公共文体服务可及性	公共文体服务可及性指数	0.205	0.206	0	1
客观福祉	农户的客观生活水平指数	0.546	0.126	0	1
主观福祉	受访者对自家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比较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3.875	0.915	1	5
微观公平认知	“您同意个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把握机会的说法吗”：完全同意=5，比较同意=4，无所谓=3，比较不同意=2，完全不同意=1	2.729	1.187	1	5
宏观公平认知	“总体而言，您同意当今社会是公平的吗”：完全同意=5，比较同意=4，无所谓=3，比较不同意=2，完全不同意=1	3.845	1.081	1	5
年龄	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周岁）	58.423	12.516	18	80

表3 (续)

性别	男=1, 女=0	0.665	0.472	0	1
受教育程度 (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				
初中	初中=1, 其他=0	0.360	0.480	0	1
高中及以上	高中及以上=1, 其他=0	0.125	0.331	0	1
党员身份	党员=1, 非党员=0	0.157	0.364	0	1
主观社会地位	受访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 非常高=5, 比较高=4, 一般=3, 比较低=2, 非常低=1	2.624	0.813	1	5
家庭收入水平	2020年家庭常住人口的人均年收入 (元)	16459.790	21392.690	0	250000
家庭健康负担	家庭患有慢性病、大病的人数占比	0.337	0.368	0	1
家庭关系网络	反映家庭关系网络的指数	0.766	0.194	0	1
村庄财政投入	2020年村庄财政投入总额 (万元)	251.021	515.881	2.800	4100
村庄属性	脱贫出列村=1, 一般村=0	0.514	0.500	0	1

注: ①观测值数为 1036。②“家庭关系网络”用与受访者家庭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和村镇干部人数来测量, 并采用熵值法将 3 个指标合成一个综合指数。③就家庭收入水平和村庄财政投入这两个变量而言, 表中所展示的是原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后文回归模型中则进行取对数处理。

(三) 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 (农户获得感) 是有序离散响应变量, 本文采用广泛使用的有序 Probit 模型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具体而言, 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y_i = F(\bet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8)$$

(8) 式中: y_i 为因变量, 即农户获得感; X_i 表示自变量向量, 例如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等; β 为自变量的待估计系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F(\cdot)$ 为非线性函数, 具体形式为:

$$F(y_i^*) = \begin{cases} 1, y_i^* \leq \mu_1 \\ 2, \mu_1 < y_i^* \leq \mu_2 \\ \dots \\ j, y_i^* > \mu_{j-1} \end{cases} \quad (9)$$

(9) 式中: μ_1 、 μ_2 和 μ_{j-1} 为切割点, 均为待估参数; y_i^* 是样本农户 i 潜在的真实获得感, 由于该值不可观测, 故为潜变量。该潜变量满足:

$$y_i^* = \bet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0)$$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 4 报告了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影响农户获得感的估计结果。其中,

模型 1 为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模型 2 则加入了地区虚拟变量。整体来看，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在两个模型之间没有明显变化，表明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最重要的是，从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能够明显增强农户的获得感。因此，本文的假说 H1 初步得到验证。

表 4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1.879***	0.447	1.717***	0.458
年龄	0.183*	0.111	0.241**	0.114
年龄平方	-0.005	0.005	-0.004	0.005
性别	0.119*	0.072	0.125*	0.072
初中	-0.174**	0.079	-0.133*	0.080
高中及以上	-0.287**	0.120	-0.255**	0.120
党员身份	-0.034	0.103	-0.034	0.103
主观社会地位	0.489***	0.051	0.500***	0.053
家庭收入水平	0.041*	0.024	0.060**	0.024
家庭健康负担	-0.175*	0.091	-0.177*	0.094
家庭关系网络	0.395**	0.188	0.347*	0.193
村庄财政投入	0.080***	0.017	0.072***	0.017
村庄属性	-0.110	0.068	-0.022	0.071
地区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 ²	0.090		0.110	
Wald 卡方值	199.43***		249.54***	
观测值数	1036		1036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二）不同类型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基础上，本文还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结果表明，公共教育服务可及性、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劳动就业服务可及性均对农户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公共教育服务可及性、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劳动就业服务可及性的提升能够提高农户的获得感。值得指出的是，公共文体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需求视角来看，受城镇化的影响，中西部区域农村的常住人口以老年群体为主（样本中受访农户的平均年龄为 58 岁），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和参与生计活动的时间约束，这部分群体对村里的公共阅览室、公共文化场馆等设施的利用率较低，对文化产品展播、科技推广传播等活动的参与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从供给角度来

讲，符合乡村生产生活特征的高质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相对缺乏，未能有效满足农户的实际需求。

表 5 不同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有序 Probit 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公共教育服务可及性	0.382*	0.231						
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			1.635***	0.385				
劳动就业服务可及性					0.998***	0.258		
公共文体服务可及性							0.114	0.16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R ²		0.105		0.111		0.107		0.105
Wald 卡方值		236.62***		254.24***		240.20***		236.78***
观测值数		1036		1036		1036		1036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此处所用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一致。③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三）内生性处理

本文重点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但是，对该问题的科学回答可能面临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两大内生性问题的挑战。首先，农户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不仅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还与农户自身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化需求有关。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这种差异化需求的具体表现是：发展境遇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户对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有着更大的需求，这些农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与利用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积极。其次，尽管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农户获得感的关键变量，但是，基于截面数据的回归模型仍无法有效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因素的可能影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参照 Kolkko（2012）的研究，本文通过引入地区平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地区人均公共预算支出^①两个工具变量，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从相关性来看，由于地区平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是通过剔除样本所在村庄之后计算的同县其他村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同县农户在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面临的共同情况，故地区平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与农户自身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地区人均公共预算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政府对民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和供给能力，因而与本地区农户的基本公共服务获取和利用状况高度相关。因此，本文所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从外生性来看，在控制了村庄差异的基础上，地区平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地区人均公共预算支出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获得感，即便有影响，这种影响也是通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产生的间接影响，

^①地区人均公共预算支出包含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目。此处所用数据来自湖北省统计局发布的 2021 年各市州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网址：<http://tjj.hubei.gov.cn/tjsj/sjkscx/tjnj/gszty/yys/>。

故本文所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农户获得感）为有序离散响应变量，基于线性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工具变量方法已不再适用，故本文采用 Roodman (2011) 提出的条件混合过程 (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简称 CMP) 方法解决混合模型的一致性估计问题。CMP 方法适用于有序离散响应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能够汇报系统方程的某些关键统计量，已被学术界广泛采用 (张晨等, 2022)。根据表 6 可知，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地区平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地区人均公共预算支出均对农户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具有正向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分别在 1%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rho_{12} 均显著异于 0，即拒绝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表明采用 CMP 方法进行估计所得结果比原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更有效。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偏误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为正，再次表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增强农户获得感这一研究结论是真实可信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影响的 CMP 估计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农户获得感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农户获得感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1.925*** (0.491)		1.850*** (0.424)
地区平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0.027*** (0.008)			
地区人均公共预算支出			0.003** (0.0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不控制	已控制
atanrho_{12}		-1.812*** (0.305)		1.204*** (0.442)
Wald 卡方值		3040.40***		988.71***
观测值数		1036		1036

注：①***和**分别表示 1%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此处所用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一致。

(四)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与剔除样本。首先，基于比较维度的差异，可以将获得感具体划分为纵向时间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和横向空间维度的“横向获得感” (吕小康和黄妍, 2018)。从获得感的内涵来看，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地位流动作为人们实际获得结果的综合体现，对个体的得失感知具有重要影响 (黄艳敏等, 2017)。因此，为避免被解释变量因测量误差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通过农户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比较来测量其获得感，进而开展稳健性检验。其中，横向获得感体现为农户

与村庄内其他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横向比较,用受访者对问卷中“在您看来,您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村处于何种水平”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测量,受访者的可回答选项包括“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共计5个选项,本文将其依次赋值为1~5的整数。纵向获得感体现为农户与自身过去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纵向比较,用受访者对问卷中“相对过去五年而言,您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测量,受访者的可回答选项包括“显著下降”“略有下降”“无变化”“略有提升”“明显提升”共计5个选项,本文将其依次赋值为1~5的整数。其次,由于武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之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也更好,因此,将武汉地区的样本与其他地区的样本一起进行回归可能会因地区差异而产生估计偏差。为此,本文还通过剔除武汉市农户样本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以上两种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发现,其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与剔除样本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剔除武汉市样本
	横向获得感	纵向获得感	农户获得感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1.207*** (0.435)	2.102*** (0.401)	1.814*** (0.46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 ²	0.127	0.077	0.105
Wald 卡方值	269.88***	232.60***	210.16***
观测值数	1036	1036	956

注:①***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此处所用的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一致。

2.纠正选择性偏误。农户是否获取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获取后享有多少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取决于当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也取决于农户自身的实际需求。一方面,由于脱贫攻坚时期政府在医疗服务、就业支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大量投入,一些脱贫出列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高,能为本村农户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机会;另一方面,因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部分农户对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更高的需求或具备享有相关服务的资格,例如低收入农户具有更为迫切的社会救助需求且更符合相关救助条件。基于以上分析,农户在选择和获取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可能并不是随机的,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获取是由个体、家庭、村庄等特征所决定的自选择过程,直接将农户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情况纳入回归模型可能会因为非随机抽样的存在而产生选择性偏误。为了纠正可能出现的选择性偏误,并解决传统倾向得分匹配模型仅能评估处理变量为虚拟变量时的净效应这一不足,本文采用 Hirano and Imbens (2004) 提出的适合连续变量的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简称 GPSM) 估计不同处理水平下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影响的净效应。

具体而言,在估计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分布情况的基础上,本文计算倾向得分值并对样本进行匹配。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在[0, 1]区间内的分布集中于0值附近,故本文尝试在处理强度取值较小的部分进行细分,在取值较大的部分进行粗分,以10分位、25分位和50分位处的取值作为处理强

度的临界值，将农户样本按照处理强度值划分为4组，在每一组内部又按照倾向得分值将样本平均分为5段。为使结果更为稳健，本文选择三阶多项式拟合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在估计平均剂量反应函数和处理效应时，本文设定步长为0.01，设定0、0.01、0.02、…、0.99、1.00共101个处理强度值。图3为通过GPSM方法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强度和农户获得感之间关系。其中，左图报告的是平均剂量反应函数，右图报告的是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强度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处理效应）。从图3可以发现，总体上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高能够提升农户的获得感，这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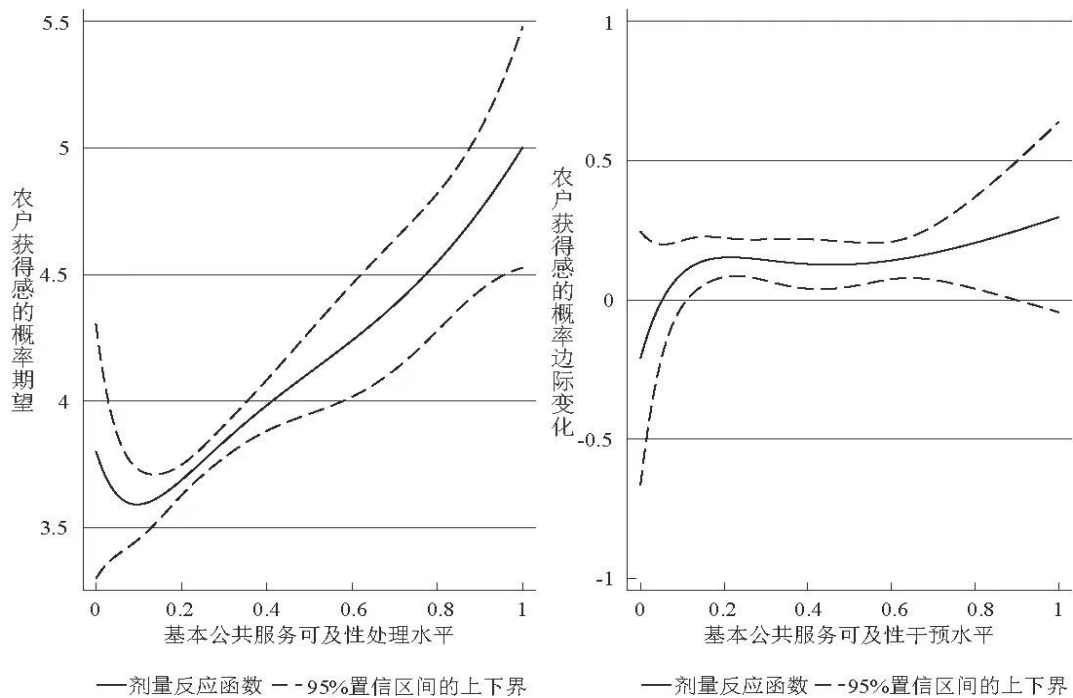


图3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

五、机制讨论与异质性分析

（一）生活福祉和公平认知的作用机制检验

由前文分析可知，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以便验证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间接影响，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检验。由于传统的中介效应分解方法主要适用于线性模型，故本文采用适用于非线性模型的KHB方法^①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间接影响。KHB方法通过对估计系数的比较，可以将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Karlson et al.，2012）。

^①该方法由Karlson、Holm和Breen三位学者提出，故被简称为KHB方法，具体可参见Karlson et al.（2012）。

1.生活福祉的耦合效应。生活福祉既是对个体生活水平的综合反映，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户实际获得的重要衡量指标。所以，农户生活福祉的改善也会带来其获得感的提升。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社会情境下，广大农民生活福祉的改善更多地指向了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的补齐与消除（缪小林等，2020）。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解决民生公共服务领域农户急难愁盼的利益问题，切实改善农户在收入消费、健康就业、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福祉水平；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供给不充分、供需不匹配、使用不便利等问题，满足农户对美好生活的心理期待。因此，根据理论上的分析可以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可以通过增进农户的生活福祉，促进其获得感的提升。下面，本文将采用 KHB 方法对此进行验证。

表 8 报告了基于 KHB 方法的估计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的估计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且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生活福祉在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的间接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客观福祉解释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影响总效应的 22.12%，主观福祉解释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影响总效应的 31.22%。上述结果表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改善农户的客观生活条件、提高农户的生活满意度，进而促进农户获得感的提升。至此，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说 H2 得以证实。

表 8 作用机制分析：基于 KHB 方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生活福祉		公平认知	
	模型 1 客观福祉	模型 2 主观福祉	模型 3 微观公平认知	模型 4 宏观公平认知
总效应	2.301*** (0.424)	2.447*** (0.431)	2.393** (0.429)	2.340*** (0.425)
直接效应	1.792*** (0.434)	1.683*** (0.433)	1.936*** (0.430)	2.033*** (0.427)
间接效应	0.509*** (0.116)	0.764*** (0.187)	0.457*** (0.137)	0.307*** (0.09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中介效应占比(%)	22.12	31.22	19.11	13.12
观测值数	1036	1036	1036	1036

注：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中介效应占比为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

2.公平认知的诱致效应。作为个体对自身得失的感知的重要前因变量，公平认知对农户获得感的产生具有决定性影响。作为社会再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缓解农户因收入分配不公而形成的“不公平感”（周绍杰等，2015）。

具体而言，从农户需求视角来看，民生公共服务关乎农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农户在民生福祉方面的实际获得，进而降低农户对自我获得状况的相对剥夺感。

从政府供给视角来看，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之间、人群之间以及地域之间的非均衡现实，极大地损害了农户对社会分配环境的相对公平认知（缪小林等，2017）。相反，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非均衡性的减弱，这有助于保障农户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机会与权利，进而促进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感向个体获得感的顺利转化。基于此，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增进农户的公平认知，促进其获得感的提升。下面，本文将采用 KHB 方法对此加以验证。

基于 KHB 方法的估计结果见表 8。模型 3 和模型 4 的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且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公平认知在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的间接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微观公平认知解释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影响总效应的 19.11%，宏观公平认知解释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影响总效应的 13.12%。上述结果表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增进农户对自我获得状况和社会分配环境的公平认知，进而提升其获得感。至此，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说 H3 得以证实。

（二）基于农户类型差异的分样本估计结果

脱贫攻坚实施以来，低保兜底、“985”医疗报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公益性岗位等民生政策作为促进农村减贫的政策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农村困难群体的减贫实践。一些研究表明，大量扶贫政策持续向贫困群体的重点倾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脱贫户与一般农户的福利差距，形成了所谓的“福利悬崖效应”（林万龙和刘竹君，2021）。在个体层面，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方来看，民生政策的重点倾斜意味着脱贫群体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基本公共服务，这可能使这类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水平更高，获得感也相应更强。因此，本文将农户是否为脱贫户作为分类依据，将样本农户划分为脱贫户和一般农户两类群体进行分组回归，以此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是否会因为农户属性的不同而对其获得感产生差异化影响。

表 9 的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脱贫户和一般农户的获得感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似无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简称 SUR）对组间系数差异的检验结果则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脱贫户和一般农户的获得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费舍尔组合检验的系数差值在 5% 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说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脱贫户获得感的提升作用更大。

表 9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影响农户获得感：基于农户类型的差异性

变量	SUR 检验（有序 Probit）		费舍尔组合检验（OLS）	
	脱贫户	一般农户	脱贫户	一般农户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3.555*** (0.785)	1.032* (0.527)	2.043*** (0.510)	0.637* (0.403)
常数项			1.395*** (0.389)	2.102*** (0.29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429	607	429	607

表9 (续)

χ^2 系数差值	6.280**	1.406**
------------------	---------	---------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此处所用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一致。

(三) 基于村财政投入水平差异的分样本估计结果

在村级层面，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来看，财政投入水平与该村医疗卫生、文体服务、就业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密切相关。前期的脱贫攻坚以及当下的乡村建设行动都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注入了大量的资源，使农村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农民的精神风貌均得到了极大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受财政资源的稀缺性与行政发包制的目标导向影响，相关资源投入在村与村之间并不均衡（涂圣伟，2020），这就使农户在基本公共服务福利的获得上形成了一定的“马太效应”。例如，一些试点示范村、明星村、重点村集聚了更多的财政资源，这些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成效也更好，因而不同的村在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为检验这种财政资源投入的差异是否会对不同村农户的获得感产生差异化影响，本文依据农户所在村财政投入的均值将所有样本划分为高财政投入水平村和低财政投入水平村两类，重新进行分组回归，以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是否会因为村财政投入水平的不同而对农户的获得感产生差异化影响。

表 10 的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高财政投入水平村和低财政投入水平村农户的获得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似无相关回归模型（SUR）对组间系数差异的检验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在高财政投入水平村和低财政投入水平村具有显著差异。同时，费舍尔组合检验的组间系数差值在 5%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表明村庄获得的财政投入越多，该村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越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提升效应越明显。

表 10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影响农户获得感：基于村财政投入水平的差异性

变量	SUR 检验（有序 Probit）		费舍尔组合检验（OLS）	
	高投入村	低投入村	高投入村	低投入村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	5.582*** (1.471)	2.313** (1.095)	1.847*** (0.464)	0.652* (0.376)
常数项			2.441*** (0.397)	1.731*** (0.33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416	620	416	620
χ^2 系数差值	3.180*		1.195**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此处所用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一致。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21年湖北省7个地级市（自治州）103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系统评估了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这一作用因农户类型和村庄财政投入水平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具有显著的获得感提升效应，在利用CMP方法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和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公共教育服务可及性、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劳动就业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提升作用较为突出，公共文体服务可及性没有显著提升农户的获得感。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能够通过增进农户的生活福祉和公平认知，促进农户获得感的提升。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农户类型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脱贫户获得感的提升效应更大；从村庄财政投入水平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户获得感的提升效应在高财政投入水平村更为明显。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提升农户的获得感。据此，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农户对美好生活更加向往，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成为影响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因此，党和政府需要聚焦农户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稳步提升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不断改善农户的生活福祉，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提升农户的获得感。

具体而言，首先，要持续推进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区域间、人群间的实际差距。与此同时，要提高农户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利用率，切实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要以提升农户获得感为导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评价标准，弥补现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需求侧的忽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切实解决农户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为提升农户获得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主要从可及性角度考察了农户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与利用水平，未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便利性、普惠性等维度，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考察尚不全面；第二，本文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使用截面数据验证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缺陷，未来可以采用长期跟踪调查的方式，获得面板数据来进一步验证因果关系。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例如均等化供给、服务质量）与城乡居民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丰富并完善该研究领域的经验研究成果，为提升中国城乡居民获得感、发挥获得感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中的作用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参考文献

1.陈秋红, 2019:《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基于农民需求的视角》,《改革》第6期,第92-101页。

- 2.邓睿, 2022: 《卫生服务可及性如何影响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 ——基于流动人口健康重点领域专题调查的证据》, 《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第165-184页。
- 3.丁元竹, 2016: 《让居民拥有获得感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第2期, 第18-23页。
- 4.郭美荣、李瑾、马晨, 2021: 《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与提升策略》, 《中国软科学》第7期, 第13-20页。
- 5.黄艳敏、张文娟、赵娟霞, 2017: 《实际获得、公平认知与居民获得感》, 《现代经济探讨》第11期, 第1-10页。
- 6.姜晓萍、康健, 2020: 《实现程度: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的新视角与指标构建》, 《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 第73-79页。
- 7.姜晓萍、吴宝家, 2022: 《人民至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管理世界》第10期, 第56-70页。
- 8.李实、杨一心, 2022: 《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第27-41页。
- 9.林万龙、刘竹君, 2021: 《变“悬崖效应”为“缓坡效应”? ——2020年后医疗保障扶贫政策的调整探讨》, 《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第53-68页。
- 10.刘玮琳、夏英, 2018: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和三阶段Malmquist模型》, 《现代经济探讨》第3期, 第123-132页。
- 11.骆永民、王晓彤、王红领, 2021: 《农村公共服务: 患寡、患停滞还是患不均》, 《农业技术经济》第10期, 第134-144页。
- 12.吕小康、黄妍, 2018: 《如何测量“获得感”? ——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第46-52页。
- 13.毛捷、赵金冉, 2017: 《政府公共卫生投入的经济效应——基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第70-89页。
- 14.缪小林、王婷、高跃光, 2017: 《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不同经济赶超省份的分组比较》, 《经济研究》第2期, 第52-66页。
- 15.缪小林、张蓉、于洋航, 2020: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 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到“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中国行政管理》第2期, 第67-71页。
- 16.任梅、刘银喜、赵子昕, 2020: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体系构建与实现机制——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第12期, 第84-89页。
- 17.谭旭运、董洪杰、张跃、王俊秀, 2020: 《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第5期, 第195-217页。
- 18.檀学文、吴国宝, 2014: 《福祉测量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加速城镇化背景下福祉测量及其政策应用”国际论坛综述》, 《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第87-96页。

- 19.涂圣伟, 2020: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第2-12页。
- 20.王浦劬、季程远, 2018: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 《中国行政管理》第1期, 第6-12页。
- 21.王瑜, 2019: 《电商参与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了吗?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差异》,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37-50页。
- 22.项久雨, 2019: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 《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第4-24页。
- 23.辛超丽, 2021: 《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农民获得感的路径探析——基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视角》, 《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 第146-152页。
- 24.邢占军、牛千, 2017: 《获得感: 供需视阈下共享发展的新标杆》, 《理论学刊》第5期, 第107-112页。
- 25.尹栾玉, 2016: 《基本公共服务: 理论、现状与对策分析》, 《政治学研究》第5期, 第83-96页。
- 26.郁建兴、秦上人, 2015: 《论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 《中国行政管理》第4期, 第47-51页。
- 27.张晨、马彪、仇焕广, 2022: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 》, 《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第56-75页。
- 28.张楠、寇璇、刘蓉, 2021: 《财政工具的农村减贫效应与效率——基于三条相对贫困线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49-71页。
- 29.郑建君, 2020: 《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与现状——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 《政治学研究》第6期, 第89-103页。
- 30.周绍杰、王洪川、苏杨, 2015: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管理世界》第6期, 第8-21页。
- 31.Andersen, R. M., 1968, "Families' Use of Health Services: A Behavioral Model of Predisposing, Enabling, and Need Components", PhD Dissertation, Purdue University.
- 32.Baldini, M., V. Peragine, and L. Silvestri, 2018,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Subjective Poverty in Europe",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64(3): 371-395.
- 33.Cascetta, E., A. Carteni, and M. Montanino, 2013, "A New Measure of Accessibility Based on Perceived Opportunitie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87: 117-132.
- 34.George, L. K., and L. B. Bearon, 1980,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Person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106-185.
- 35.Hirano, K., and G. W. Imbens, 2004, "The Propensity Score with Continuous Treatments", in A. Gelman and X. L. Meng (eds.) *Applied Bayesian Modeling and Causal Inference from Incomplete-Data Perspectives: An Essential Journey with Donald Rubin's Statistical Famil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73-84.
- 36.Karlson, K. B., A. Holm, and R. Breen, 2012, "Compar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ame-Sample Nested Models Using Logit and Probit: A New Method", *Sociology Methodology*, 42(1): 286-313.
- 37.Kolko, J., 2012, "Broadband and Local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71(1): 100-113.

- 38.Penchansky, R., and J. W. Thomas, 1981, "The Concept of Access: Definition and Relationship to Consumer Satisfaction", *Medical Care*, 19(2): 127-140.
- 39.Roodman, D., 2011, "Fitting Fully Observed Recursive Mixed-process Models with CMP", *The Stata Journal*, 11(2): 159-206.
- 40.Runciman, W.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69-97.
- 41.Sarma, M., 2016, "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Using Multidimensional Data", *World Economics*, 17(1): 15-40.

(作者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马太超)

How Does the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Affect Rural Households' Sense of Gai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036 Rural Households from Hubei Province

LI Dongping TIAN Beiha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ive welfare effect of the equalized construc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rural households' sense of gain and its mechanism based on data from 1036 questionnaire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seven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 in 2021.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rural households' sense of gain, and the findings remain robust after the 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method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re used to mitigate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of the model.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 on rural households' sense of g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s,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s are more prominent, while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cultural and sports service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rural households' sense of gain.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enhances rural households' sense of gain through improved life well-being and fairness percept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ense of gain for poverty-alleviated households than the general rural households, and the effect of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the sense of gain is greater in villages with high levels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than with low levels. This study helps to examine and clarify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share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enhancement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well-be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hared development by the equalized construc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Keywords: Sense of Gain;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Life Well-being; Fairness Perception